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

(一九九二年度)

金家滋 陆红妹
赵秀英 张莉 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前 言

近年来，我国民族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发表的论文，每年数以千计。这些论文分载于各类刊物中。由于目前全国发行的刊物数量很大，发行的渠道又各不相同（有的公开发行，有的自办发行，有的是内部刊物），就一地、一单位而言，若要见到所有有关刊物，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单位不可能全部订阅，也不可能期期不缺。这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即便是能见到所有刊物，面对如此大的量，一期期去翻阅，一篇篇去查找，耗时费力，亦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

我所图书资料室每年都订阅大量专业刊物。在编辑此《汇编》过程中，我们除翻阅了本所所藏刊物外，还查阅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当年度社会科学的有关刊物，并参考了其它单位收藏的刊物。

编此《汇编》的主要难点在于确定选文范围。这实际上要求回答“什么是民族史？”“民族史都包括哪些范畴？”等问题。这本是一个较大的科研课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获统一认识。当然，核心问题比较清楚，其边沿问题，特别是与相邻学科的交叉问题实难把握。诸如，民族史与民族学、民族古代文学、民族古文字、民族古籍、民族地区考古等文章的区分与归类；民族史与地区史（如新疆史、云南史、台湾史、东北史等）、边疆史、朝代史（如辽金史、元史、清史等）的划分与界定等，都是难于断然确言的。为了确保本《汇编》的内在质量，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汇编》的编选原则。

本《汇编》分卷主要以民族，一般以民族发源地为标准。如蒙古族、满族虽曾统一全国，仍按其民族分别归入北方卷和东北卷；再如西辽，按地域应入西北卷，但我们仍按其民族（契丹）归入东北卷。

类此，讨论云南蒙古族和西蒙古的文章皆归北方卷。羌族问题比较复杂，古羌的活动重心虽在西北，然其活动大范围仍包括西南地区，鉴于今羌活动中心在西南地区的情况，故将讨论羌族的文章全归入西南卷，以便集中查找。有关东夷等文章附入东北卷后。

鉴于研究北方民族文章量很大的情况，考虑到读者查找方便，本《汇编》将整个北方分订为东北、西北、北方三卷。这里的“北方”是指生息于蒙古高原一带的民族，如匈奴、柔然、蒙古族等，而综合研究三北民族的文章则收入综合卷。

为扩大读者视野，本《汇编》还酌情收了港台刊物的研究文章。由于共知的原因，这些文章在观点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一并印出，仅供研究工作参考，特作说明。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不详尽占有资料，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为了科研工作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1992年度），经过一年的努力，又与读者见面了。

本《汇编》采用原文静电复印汇集装订形式，按年度分卷汇编，本年度分为七卷：综合卷、北方卷、东北卷、西北卷、西南卷、中、东南卷、西藏卷。各卷再依文章多寡分册装订。

在我们编选的过程中，曾得到于宝麟、刘凤翥、任一飞、杨绍猷、祝启源、黄庭辉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业务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本《汇编》一定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经便在下年度的编辑过程中改正。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编委会

凡 例

一、本《汇编》是为研究与教学人员提供的基本资料，收录范围包括对民族源流的探讨和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二、“民族”区别于“地域”。诸如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台湾”、“东北”、“西北”等主要从地区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其中内容重点谈论民族的则酌情收录。

三、对在全国建立王朝的民族政权（如元、清），一般问题作朝代史处理，本《汇编》只收其中有关民族的文章。

四、关于民族古代文学与古文字的文章，如主要从文学角度分析或单纯的文字解读一般不收，如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民族史实和民族历史人物，利用民族古文字研究民族史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五、涉及民族古籍（例如《蒙鞑备录》、《契丹国志》、《高丽史》、《南诏野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清实录》等等），包括民族文字古籍（如《西南彝志》、《满文老档》、《福乐智慧》、《格萨尔王传》等等），如从语言文字或文学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如从历史或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考据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六、一般考证地名沿革的文章不收，如对民族史关系极为密切的则收。

七、关于民族地区考古文章，如单纯从考古角度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一般不收，如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民族历史问题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八、鉴于文章量过大，受经济条件限制，本《汇编》决定重点收录研究性文章。对于一般性的书刊介绍（尤其是广告式的介绍）、会议报导（尤其是新闻式的报导），以及宣传普及性的介绍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学术性强的书评，以及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研究综述等酌情收录。

九、港台文章因是竖排，为装订方便，皆在各册之后。

目 录

论西北地区民族的迁徙及贡献·····	杨东晨
秦汉时期宁夏的经济开发·····	赛连荣
隋帝西巡·····	卫 心
五代以来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从“吐蕃已微弱， 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他，而不是有其人民”谈起·····	高自厚
北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熟户·····	李 挺
乾隆帝进军西北失误读议·····	袁森坡
青海古代民族医学的交融·····	毛继祖
清代新疆教育述略·····	马文华
新疆近代史研究回顾·····	厉 声
近代新疆货币述略·····	王昭武
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	马大正
新疆辛亥革命的特点·····	黄建华
1949年以来新疆地方古代史研究述评·····	苗普生
关于新疆古代衣着质料的初步研究·····	尚衍斌
新疆地名研究史概略·····	牛汝辰
从新疆地名看历史上的移民·····	牛汝报
远古新疆属华夏·····	刘正民
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的必然·····	陈 华
新疆各族妇女在祖国统一中的历史贡献·····	殷红梅
试论额敏和卓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黄建华
伊犁御塘道之创置与新疆开辟之关系·····	马楚坚
环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及其文化·····	侯 灿
蒙、元时期甘肃的少数民族·····	杨建新
近年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概况·····	侯旭东

宋代陇右的民族贸易·····	李清凌
古代青海交通西域的路线及其历史沿革·····	吴 焯
西域和祖国的关系——公元840年以前·····	程溯洛
略论宁夏各族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	康春英
贺兰山岩画的文化蕴涵·····	张迎胜
吐鲁蕃出土伏羲女娲画像的艺术风格及源流·····	赵 华
吐鲁蕃古代衣饰习尚谈荟·····	尚衍斌
顿敏和卓家族统治吐鲁蕃盆地时的维吾尔族部落及人口·····	黄建华
有关莎车发现的喀喇汗王朝文献的几个问题·····	林梅村
从《平番奏议》看清代甘肃各族人民间的经济友好关系·····	马悦兰
狼图腾文化初探·····	李树辉
先秦羌戎融华考·····	李范文
广采博纳的古代西域文化·····	钱伯泉
西汉西域都护略论·····	李大龙
北朝流行的西域乐舞·····	钱伯泉
佛教与西域文化·····	陈国光
我国近十年来西域民族史研究的特点及展望·····	周伟洲
蜀宾考·····	余太山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与丝绸之路上的石窟遗迹·····	常 青
漠北草原丝道初探·····	陈良伟
唐长安城寺院与丝绸之路·····	陈忠凯
楼兰古尸的发现及其研究·····	穆舜英
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绸贸易·····	张荣芳
唐代历任鄯州刺史考述·····	米海平
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	韩康信
乌孙西迁年代综考——西汉乌孙关系专题再研究·····	王明哲
关于月氏族文化的初探·····	赵建龙
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	殷 晴

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	荣新江
五代宋初于阗王统考.....	孟凡人
于阗故都新探——兼议西域南道的变迁.....	谭吴铁
论西方文化对古于阗的影响.....	李吟屏
汉唐龟兹史事琐谈.....	肖之兴
古代龟兹服饰述略.....	尚衍斌
论龟兹石窟中的人民精神.....	朱英荣
龟兹绘画研究(上).....	徐建融
龟兹绘画研究(下).....	徐建融
丁零——铁勒的西迁及其所建西域政权.....	薛宗正
敕勒非丁零考辨.....	陈世良
从吐鲁番文书看薛延陀前期历史.....	钱伯泉
试论魏晋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渊源流变.....	李宝通
从吐鲁番文书看麹化高昌土地制度.....	吴震
军政合一在边陲——从高昌郡看十六国时地方军政制度.....	严耀中
高昌得名新探——兼说有关戊己校尉的几个问题.....	王素
高昌、西州时期量制考.....	徐庆全
宕昌国王城地望辨析.....	裴卷举 王俊英
论吐谷浑民族的形成及其特点.....	胡小鹏
试论后赵、前燕、前秦统治政策汉化成分之差异及其原因.....	要瑞芬
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洽途径.....	陆庆夫
南凉政权与徙民政策.....	【日】关尾史郎著 孙耀李 凭译
羯族皇帝、石勒.....	王梅堂
略论北宋初期的宋夏灵州之战.....	李蔚

论西北地区民族的迁徙及贡献

杨 东 晨

西北史地

92.3.10

中华民族，包括汉、藏、回、蒙等五十六个民族。历史上有过的民族，更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研究历史上民族的形成、迁徙、融合及其贡献，对经济的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拙文只对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兴起、发展、迁徙、融合及贡献加以探讨和研究。

一、西北地区民族的形成

西北地区的范围，一般指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古代这一地区属雍州、梁州、西域的一部分。其中属雍州的地区，即今陕西关中、陕北，甘肃、宁夏部分及青海等地，自旧石器时代就有猿人活动，如距今百余万年的蓝田人，猿人向古人过渡阶段的大荔人等。属于猿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有陕西蓝田公王岭及涝池，渭南，临潼，潼关，西乡县梁山，甘肃庆阳，新疆吉日尕勒、玉龙喀什，青海唐古拉山等。属于古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西北主要有：陕西的榆林、神木、吴堡、长武，宁夏灵武洞，新疆塔里木盆地，青海贵南，甘肃陇东、兰州、临夏等。属于新人阶段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有：陕西大荔的沙苑文化，甘肃陇山东西两侧的泾川人、武山人文化，青海湖南岸遗存文化，宁夏灵武水洞沟、中巴长流水等。这就是说，西北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

约在距今一万年时，进入新石器时代，血缘氏族已广泛出现于西北地区。宁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遍布南北，而以南部山区最为密集；新疆在天山东部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较多，如吐鲁番阿斯塔那、辛格尔遗址等；甘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以东、南部较为集中，如秦安大地湾、镇原、庆阳、礼县高寺头等；青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湟水流域；陕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渭水、汉水及其支流地区。在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这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及仰韶文化时期，西北的主要母系氏族有：宁夏与陕西北部的荤育、山戎；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有熊氏族、炎帝氏族；陕西关中有炎帝氏族、有姁氏族；甘肃西部及青海、新疆等地有戎族（含氐羌）。反映这些氏族的前仰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陕西有老官台文化北刘类型，主要遗址有渭南北刘下层、商县紫荆下层、临潼白家等。老官台文化北首岭类型，遗址有宝鸡北首岭下层，彬县下孟村下层等，汉江上游的李家村文化遗址，有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汉阴阮家坝、紫阳白马石与马家营等；甘肃有秦安大地湾遗址下层；青海有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遗址等；宁夏有固原地区的“海原菜园村林子梁”类型遗址；新疆有哈密七角井、罗布泊等遗址。这些遗址上限为距今8千至6千年（有的还要晚一些），约相当距今7千至5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在西北地区更加普遍，典型代表遗址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华县元君庙、西乡何家湾，甘肃大地湾（中、晚期）、马家窑文化遗存等，青海有武山、阳

洼坡等马家窑型遗址 600 多处，宁夏有海原菜园洼西的沟儿洼、马樱子梁遗址等。其后，进入父系社会。

《史记·五帝本纪》载：“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尚书·禹贡》雍州条云：“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周秉钧《尚书易解》（岳麓书社，1984 年版）注：郑玄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昆仑，马融曰：“在临羌西。”即今青海西宁之西。析支，马融曰：“在河关西。”即今青海西宁西南。渠搜，《汉武帝纪》应劭注：“《禹贡》渠搜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即今甘肃兰州以西。氐、羌系西戎，同属汉藏语系。它们关系密切，故常以氐羌连称。氐、羌活动地域很广，加之尧舜时代的东迁南移，羌族活动地域尤其广大。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云：除汉族外，“古代氐、羌活动的地域可算是中国古代民族当中较为广大的。特别是羌族，自古以来从今河南一直向西，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向南直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他们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山海经·神异经》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髻、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就是说，共工部族除迁今河北北部外，还有迁入西北地区的，具体地点无可考。“三危”，《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即今甘肃敦煌地区。《五帝本纪》还载：舜放丹朱于丹，封契于商。有的学者认为即今陕西商县（古称商丹），故知今陕南有华夏族之古商国。《华阳国志》、《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巴人亦如此。由此知，陕西南部当时还有巴、蜀族及羌族。今晋北陕北的狄族，《五帝本纪》称山戎，又称薰育族。

父系氏族社会之西北诸族，在考古文化上也逐步得到佐证。郭沫若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绘出陕西龙山文化遗址有 45 处，几乎遍及全省各地。它又分为同于河南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类型和长安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类型。前者为关中东部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主要有陕西华阴县横阵村、华县虫陈村，西部的武功县西庄、赵家来、扶风县案板，陕北绥德县小官道、陕南商县紫荆、西乡李家村等，一般都分布在黄河、渭河、汉水及其支流区域。这也正是华夏族及少数民族活动、聚居的地方。客省庄二期文化属陕西境内的晚期龙山文化，又分为康家类型、双庵类型、石峁类型三种。属康家类型（临潼）的主要遗址分布在渭南以西、兴平以东，黄陵、洛川以南，以及商县紫荆等；属双庵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武功县以西至陕甘交界地区；属于石峁文化类型（陕西神木县）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陕北黄河两岸诸支流附近的山梁上。此外，陕南汉水上游西乡县红岩坝遗址、丹水上游靠下的丹凤、商南、山阳、镇安一带，其龙山文化既有客省庄二期，又有河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的因素。关中东部郭华县、华阴、潼关一带的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既有客省庄文化因素，又有晋南、豫西龙山文化因素。关中西部的陇县、长武、彬县一带分布有齐家文化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呈现出的地域性，正是上述不同民族或部族文化差异性的反映。

齐家文化是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布范围仍是甘肃东部及其相连的青海、宁夏一带，泾水、渭水、白龙江上游、清水河、黄河、湟水、大夏河两岸的台地上。其文化遗址，甘肃 21 处、青海 6 处、宁夏 1 处。从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及

彩陶看，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和渔猎为辅，和陕西龙山文化的人们一样，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甘肃洮河流域还发现有寺洼文化，墓葬中有火葬现象。与此类似的文化，在青海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村也有发现，称“卡约文化”。其分布以湟水流域为中心，东起甘肃、青海交界的黄河沿岸，北到青海湖北岸，西至海南，南抵黄南。其经济形态，以畜牧为主，在小块地区经营农业。生产工具中有石斧、石力、石锄、石铲、骨力、骨铲、骨锥、铜力、铜斧、铜戈、铜箭头等。陶器主要是素面褐色粗陶，彩陶较少，间绘有不整齐的条纹。彩绘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其独特的风格。寺洼、卡约文化，反映了羌族的社会状况和历史。

细石器，以用石英、燧石、玛等为原料制造的形体细小精制的石器而得名。新疆、宁夏等地均有发现。细石器文化，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文化，正是戎、狄、薰育、羌、氏等少数民族（从事定居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部落除外）游牧部落生活的反映。

考察古史，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的兴起和称谓，应始于五帝时代的舜时期。因为“顺尧舜时期，也就是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和到了阶级社会门槛的时候，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已在形成了。”^①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文化提高、血缘组织瓦解、地缘关系建立、战争频繁和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居于黄河下游之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地区的华夏族，将居于四周的民族贬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又总称为“夷”族。同时，二者又无严格的界限，华夏族中战败或被流放到夷地的亦称为夷，如炎帝后裔族战败后，逃入东夷、南蛮的部分，舜流放“四凶”变为北狄、苗蛮、西戎、东夷者；夷部族强大或有功人居中者则为华夏族成员，如东夷族首领项、虞舜、陶、伯益等都入居中原为华夏族部落联盟首领或担任管理官职，其族遂成为华夏族成员等。严格地说，炎黄为主体的华夏族，也都是由西北地区的今陕西关中和陕西南部徙入中原地区的。西北地区，尤其是边区少数民族的落后状况，也只是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中原王朝的压迫、征伐，加之地理条件的限制等才形成的。

二、西北民族的迁徙和融合

所谓民族的迁徙和融合。就我国古代史的发展情况看，少数民族的向内地迁徙多于汉族的向边境迁徙。民族迁徙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有王朝的统治和战争、巩固边境、开发边疆经济、偏远地区人民为生活所迫等。

1. 夏商周时期

公元 21 世纪夏朝建立后，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民族发展也进入新阶段。夏的地域，沿袭五帝时代，居于天下之中，称中国。王畿之地，大体不出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地区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夏代的西北民族，除华夏族外，少数民族记载甚少。《竹书纪年》在帝后相、后泄时，提到吠夷，说：“帝癸即位，吠夷入岐以叛。元年，岐镇来朝。”吠夷有的认为是东夷的一支，有的认为是西戎的一支。我们认为应是北狄。这是明确记载狄族徙入今陕西岐山泾水流域的史实。

夏灭商立，是一次社会大变革。《史记·匈奴列传》云：“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

^①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写的《序》。

通于北野，随畜转徙，号葷育。”就是说，夏亡后，虞夏这两个联盟的部族，一部分迁徙到了今北方，其中有今陕北、宁夏及甘肃北部；一部分徙入东北(豕韦族)，一部分徙入江南(越之先祖)①。殷代的北方及西北方，见于甲骨文记载的少数民族有鬼方、舌方、邛方、御方和狄②。文献记载的有薰育、猺狁、鬼方、犬戎、吠夷、狄(翟)等。夏末商与东夷联军西扫夏军时进入陕西而留居的有商后裔族、嬴姓秦族、东夷吠夷族等。夏时的戎支族吠夷，殷时称为犬戎。舌方、鬼方的中心地在今陕北西部、东部。殷中期，鬼方势大，吞并舌方，进入阶级社会。考古工作者近几年在陕北清涧县李家崖发现和发掘了商代古城址，出土了许多既有殷文化因素，又有地方特色的大批文物，以及殷代陶文，被称为李家崖文化，又称鬼方文化。猺族活动于陕北与甘肃庆阳交界地。殷王朝与鬼方、舌方多次发生战争。殷墟出土卜辞中，多有伐鬼方、土方等的记载。武丁三年，伐鬼方，三年乃克，说明鬼方势力是不小的。殷的西方诸侯国先周，也常与鬼方、猺狁、犬戎等发生战争。《竹书纪年》记载：王季伐落鬼方；帝乙三年，命南仲城朔方；约十七年，周文王伐落西狄或猺狁，殷征鬼方、土方等，战争规模甚大，一次最多达五千余人，陕北出土的众多殷兵器即是佐证。这些战争，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商文化的传播。殷的西方，即今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有总称为西戎族团，见于史载的有戎、氐、羌、昆夷等。《竹书纪年》有：“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降”；《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时，“混夷駸矣”；文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猺狁之难”等。说明殷与先周与这些少数民族发生了较多的战争或经济、文化交往。殷亡西周建立后，继续与殷时的西北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或经济、文化交往，共同开发西北地区的经济。殷墟“妇好”墓的700余件玉器，大部为新疆玉。说明獯渠、戎、氐、羌向商王朝贺时，带来了宝玉。

西周时期，猺狁内徙至陕北，常向泾水流域侵扰。周穆王时期，从镐京出发，经平凉折向西南，经河西走廊入青海，至新疆，再沿昆仑山北麓至葱岭，进入里海、黑海间返回。西王母也曾入镐京朝贺。这是华夏和西域的第一次大交往。《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云：周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以东，遂迁戎于太原。”太原，指今甘肃庆阳及陕北高原。犬戎、西戎、猺狁、周人互相杂居，并向东、向南逐渐扩散。西戎的裔支义渠戎，西周时已居于今陕西宜川县。今陇西、陇南在商周已成为氐族活动地。夏商周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考古方面也有反映。如陕西宝鸡地区的“刘家文化”(夫风刘家村墓丧)，与先周文化不同，研究者认为是姜氏戎文化。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发现的国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是巴族的裔支文化。甘肃夏代羌族文化为四坝文化，主要遗址有玉门火烧沟、东灰山、西灰山等。分布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及渭水上游的辛店青铜文化，在永靖马路塬、临夏莲花台、临洮寺洼、平凉安国镇等地均有发现。学者们认为这是商至周末的氐族文化。泾、渭河上游的平凉、庆阳、天水地区及镇原、崇信县于家湾等地墓葬，不仅反映了周与秦先公的文化，而且也反映了戎狄族文化；青海辛店文化遗址，分布在湟水下游及黄河北岸，主要遗址在民和、乐都两县，约200处。以青海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村遗址命名的“卡约”文化，遗址在青海湖、祁连山一带均有发现。一

①徐中舒为《夏商史探微》(李民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写的《序》。

②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般认为寺洼、卡约、沙井、火烧沟文化为羌族文化^①。

从考古资料看，夏商周三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虽有所发展，但总的情况是落后于中原地区，其中的陕西地区，因西周建都于此，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故呈现出超越中原地区的繁荣、进步状态。

2.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确立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是民族迁徙、融合的时期。春秋时期，北狄有北戎、赤狄、白狄、长狄，战国时有胡、林胡、楼烦和匈奴等。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族分布地域很广，从豫西、山西以西，到陕西、甘肃、青海一带，都有其足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记载：有义渠戎、胸衍戎、翟戎、獯戎、乌氏戎、緄戎、邽戎、绵诸戎、丰戎、大荔戎、申戎、犬戎、冀戎、彭戏戎、亳戎、驪山戎、伯氏戎、六济戎、余无戎、始呼戎、泉皋戎、扬拒戎、陆浑戎、阴戎、太原戎、奔戎、条戎、允姓戎、蚩氏戎等。

西周末复立的秦国^②，春秋初迁都汧城（今陕西陇县）后，秦与戎的战争由西犬丘（今甘肃天水）扩大到了今关中西部。依《史记·秦本纪》载，秦从春秋至战国末年，历代国君都在扩土战争中，与戎、狄发生过战争。秦征伐过的戎部族有丰戎（今陕西岐山县境）、亳戎（今长安县与三原西）、彭戏戎（今白水县）、緄戎（亦名犬戎，活动在岐山、彬县一带）、义渠戎（今陕甘交界地及宁夏固原一带）、胸衍戎（今陕西定边与宁夏盐城一带）、绵诸戎（今甘肃天水县东与清水县南）、翟戎（今甘肃天水西北渭水上游及洮河流域）、獯戎（今甘肃陇西县境）、乌氏戎（今甘肃平凉及宁夏南部）、大荔戎（今陕西大荔）、驪戎（今陕西临潼）、邽戎（今甘肃天水市）、冀戎（今天水附近）等；秦征伐过的羌族有小虢等；狄族有匈奴（今陕西与甘肃北部）；以及南伐巴、蜀（今陕南）等。这些少数民族有的在春秋时期就被征服或灭亡，与秦族融合在一起，有的在战国才被征服和融合（如义渠戎，直到昭襄王时才被消灭），或者成为秦的边陲属地。至战国末年，除匈奴外，大都融合为华夏民族了。今青海黄河、湟水、大通河地区的羌人，部分更向西作了迁移。羌人无弋爱剑在秦厉公时被俘，后逃回，将秦生产技术带回“三河”地。其世代为羌首领，开发了该地的经济^③。秦孝公时，羌族首领研表示归顺，成为秦国的附庸。

戎族申国、缁戎、犬戎联合灭西周，显示了戎族的强大，并登上了政治舞台。晋惠公时期，诸戎受秦人排挤，被晋招入晋及河南地，从而形成陕甘交界与晋西北，泾、渭之间及整个泾水流域，伊、洛之间三个戎族活动中心地区。春秋大国争霸，戎族或狄族参与战争，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统计：从公元前722年至前637年的86年中，戎伐楚、伐郑、伐齐各1次，伐周2次，伐齐3次，鲁伐戎1次，虢伐戎2次，诸侯为戎祸守周城2次。秦、晋的强大，与征服诸戎直接相关。由此可见，戎狄内徙后，在政治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后汉书·西羌传》云：“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其范围包括了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他们发展

① 《青海风物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拙文：《东夷的发展与秦国在西方的复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③ 《青海风物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生产，修筑城镇，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至战国末，戎狄多数已为秦民。

3. 秦汉时期

经春秋战国的战争，至秦统一（公元前 221 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为北匈奴和西羌族。如果说，战国前，主要是华夏族征讨内侵的少数部族的话，那么秦汉时期，则辅以战争手段的，则主要是汉族政权派官吏、军队去镇守或徙民实边。再者就是汉政权划出一定地区，让少数民族居住，以加强控制。因此，秦汉时期的特点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开发边境经济，加快了经济、文化交流的步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南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这样以来，秦的军队、筑长城者、迁北河与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三万户、四十四县的官吏及戍卒，在长城以北河套地区的起码有五、六十万。河套地区的匈奴从战国起就与秦人有了密切关系，战国末已进入奴隶社会。内蒙发掘的百余座战国墓，出土的许多铁、铜器就说明了秦文化对其的影响。秦朝统一后，汉民的大量移入，大大促进了今陕北及河套地区经济的发展。

《史记·匈奴列传》载：楚、汉战争中，匈奴单于头曼乘机出兵复占领河套以南地区。之后，其子冒顿继位，征服了东胡、月氏，控制了西域诸部。他又北灭浑庚、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部，南吞楼烦、白羊诸部。西汉匈奴单于拥兵三十万，成为北方最强盛的少数民族。西汉时的西域，指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新疆境内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及中亚的一些国家。月氏、乌孙、塞等少数民族政权被匈奴征服后，成为进攻西汉的强大力量，对西汉构成了严重威胁。新疆诸民族多为汉藏语系的羌族。

据《史记》、《汉书》记载：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匈奴右贤王率军袭击下郡（今陕北），威胁国都长安。文帝派丞相灌婴率军八万反击，帝亲临甘泉宫（今陕西淳化）督战，击败右贤王。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老上单于率军十四万侵犯今甘肃地区，文帝命张敖如等率军痛击，才解除威胁。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西羌部落数十万人反叛，匈奴乘机配合，入侵五原（今河套地区），羌人进攻枹罕（今临夏市），形势紧张。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武帝派将军李息率军伐西羌，把反叛的羌部落驱逐到青海湖和居延海一带居住，在湟水流域的临羌县设护羌校尉，管理今甘肃与青海交界地区的民族事务和军事。汉武帝一面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结乌孙共击匈奴，一面又派大军讨伐之。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命赵破奴、王恢（与北击匈奴的王恢同名）率军进攻姑师和楼兰，击败匈奴，占据二地。在此之前，二地的经济有一定发展。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又派大将李广利率军征服了大宛。汉政府在敦煌至罗布泊之间设立驿站，又在轮台（今新疆轮台）、渠犂（今轮台东南）等地屯田，士卒多达六十多万人。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设金城郡（今兰州），加强对今甘肃榆中以西、青海湟源以东地区的统治。汉宣帝初年，青海湖地区的先零羌受匈奴引诱，北移。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宣帝派将军赵充国率军讨伐先零羌，采取打击、招抚两种政策，收效甚好，叛乱平息。汉政府充实河西四郡，又特设金城属国都尉，专门处理羌人事务，安置羌人部落。赵充国又在河湟地区屯田，修治湟峡道桥直至鲜水上（今黑河上游俄博河），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羌与汉族的和好，既隔断了匈奴的道路，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张骞

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武帝在河西走廊（今青海西宁与青海湖以北地区）东部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又在长城外设玉门关和阳关，保护这条道路。这就是文献说的“出陇右，经匈奴”，“列四郡，据两关。”这些都对汉与西方少数民族的交往、融合起了积极作用。

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匈奴复内侵。后匈奴内部争权，分裂为南、北二匈奴。南匈奴单于虚闾连归汉，光武帝授印划地，让其住在云中（郡所在今内蒙托克托北）地区，派官员协助治理。东汉政府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大军四路出击，进攻北匈奴，其中窦固军打败北匈奴呼衍王部，进至伊吾（今新疆哈密西）。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种等又击败南匈奴，俘二十余万人，南匈奴归降。这样今陕西长城以北地区的汉匈奴族互相错居，共同开发经济。在西域，东汉复派班超出使西域，重新设西域都护府，并在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设戎校尉和己校尉，加强统治。其后经反复，班超、班勇又相继任西域长史（驻所设龟兹，今库车西南），防止了匈奴的入侵。公元73年，东汉政府又设宜禾都尉（尉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公元93年，东汉开始在高昌壁屯田，重新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来往。

观察两汉的历史查《汉书》、《后汉书》的记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北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的变化，不少少数民族分别由西、北徙入甘肃及陕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人降汉，武帝置安定（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景泰、靖远、会宁、平凉、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固原等县地）、上郡（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辖境相当今陕西北部及内蒙乌审旗等地）、五原（治所在九原，即今内蒙包头市西，辖境相当今内蒙后套以东、阴山以南等地）、天水（治所在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辖境相当今甘肃通渭、静宁、泰安、定西、清水、庄浪、甘谷、张家川等县及天水市西北部、陇西东部、榆中东北部）、西河（治所在平定，今内蒙东胜县境，辖境相当于今内蒙伊克昭盟东部、山西吕梁山、芒芽山以西、石楼以北及陕西宜川以北黄河沿岸地区）五郡的塞外。就是说，匈奴已移入关东、西、北三边的周围，安定、上郡又属关中范围。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降汉，光武帝又开边缘地区八郡，其中朔方、西河二郡与关中相连，北地、安定则属关中。西羌的东徙入关中，是在建武十一年（35年）。当时马援为陇西太守，镇压西羌，徙置三辅，于是扶风（治所在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辖境相当于今陕西麟游、乾县以西，秦岭以北地区）、冯翊（治所在今高陵县西南，辖境相当于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郡，也就是今陕西关中地区都有羌族与汉族杂处。氐族原居于汉代武都郡（今甘肃成县西北）、陇西郡的氐道（今甘肃秦安县西南）、天水郡的略阳（今秦安县西北）、清水（今清水县）一带。西汉元鼎（公元前111年）置武都郡，迁氐人的一部分于汧水和陇山之间（今陕西陇县西北），这是氐人人关中的开始^①。到了东汉建安十六年，曹操率大军入关，打败韩遂、马超联军占据关中。建安二十年（215年），马超兵败南下投奔汉中张鲁，略阳兴国城的氐王率部分氐民随徙，曹操将其所遗留氐部数万落东迁入扶风美阳（今陕西扶风县北），关中氐族剧增。卢水胡，本为匈奴别支，以居于今甘肃张掖卢水之滨而得名。又因其地杂居有月氏胡和羌族，胡卢水胡族又杂有该二族之习俗。东汉末年，卢水胡东徙入关中。《魏略》云：建安二十年（215年），关中池阳（今陕西泾阳县

^①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

北)以北已有卢水胡居住,北地与冯翊之间较为集中。

汉代仍实行徙民实边政策。《汉书》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十余万口徙朔方;武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皆在西北)及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前37年),罢安定呼池苑,设安民县,徙贫民居之。东汉亦如此。

自西汉到东汉,是西北地区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又一高潮。通过汉派使者(如张骞、堂邑氏奴甘父、常惠、段会宗、义安渠国、娄敬、郭吉、苏武、王乌、班超、班勇等)、少数民族国家派质子(如圉弥太子赖丹、乌孙公主等人长安)、移民(汉与戎、氐、羌、匈奴互徙),逃降(汉将或臣降匈奴的中行说卫律、赵信、李陵、李敢等,降汉的南匈奴及氐羌等),婚嫁(匈奴、乌孙、鄯善王等都曾娶汉宗室女为妻)加速了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甘肃、新疆、青海、宁夏等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已转入农耕、定居生活,仿汉城制的诸国都城已普遍出现。甘肃庆阳、灵台、定西、泾川、环县、永昌、武威、天水、敦煌,青海湖北岸尕斯库勒湖、向阳,宁夏吴忠县关马湖、固原县郊,盐池张家场与宛记沟、海原县胡湾、灵武横城,新疆楼兰、帕米尔、和田等地发现了许多秦汉或少数民族古城遗址及墓葬。从而佐证了汉与西北各族往来的史实。

4.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20年魏国建立,吴、蜀也相继立国,形成三国鼎立局面。西北地区,除今陕南为蜀地外,其余诸地,包括河西四郡,均归魏。三国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迁徙较少。《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箕谷之役,迁西县(今甘肃礼县与和县一带)千余家于汉中。延熙十七年(254年),蜀姜维出陇西,与魏争夺,迁狄道、临洮、河宕三县之民居于繁县。三国亡后,西晋建立,政治腐败,引起八王之乱,各王为争夺皇权,勾结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乘机内徙。《晋书·武帝纪》载,塞外匈奴徙内地者十九种,十万余人,氐、羌已分布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北地(今陕西耀县)、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镇原)、南安(今甘肃陇西县)、扶风(今陕西源西南)、始平(今陕西兴平县)、京兆(今西安市)等地^①。北地还有卢水胡。《晋书·文帝纪》载:晋初,在“归服”名义下进入塞内的少数民族有八百七十余万口。其中进入西北地区长城以内的亦不会少,连巴族的别支“巴氏”也北徙入陇右地区了。青海的塞外也布满了鲜卑族。江统《徙戎论》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各族人民,在西晋的腐朽统治下,生活甚苦,遇到灾荒,不得不离井背乡,流徙他地。《晋书》记载,元康七年(297)以后,“秦、雍二州大旱疾疫”,灾荒严重,二州人民纷纷流徙梁、益、荆、豫等州谋生。其中仅汉族就约四五万户,占当时二州汉族人口的三分之一。

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又一高潮,汉化很深的氐人、羌人、鲜卑人先后在长安建立前秦、后秦、西燕、西魏和北周,并相继统一西北,建立后凉(氐人政权,都于今甘肃武威)、前仇池与后仇池(今甘肃成县,氐人政权)、武都国与武兴(今甘肃成县西与陕西略阳)国。匈奴人建立了大夏(陕西靖边)。他们主观或客观的学习汉文化,推行汉族制度,加快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进程。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先后建立了几个政权,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往来于东西方的商队和僧侣便只好改道由今青海通过。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高僧法显便是

^①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从长安出发，经西秦所在的金城郡（今兰州），溯湟水西上，经南凉都城乐都，过西平郡（今西宁市），转赴今大通、门源达张掖，沿丝绸之路古道至鄯善，越葱岭达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僧人昙无，北魏明帝神龟元年，僧人宋云海等西去求经，也都是沿此道路。西域与长安的商业来往、宗教交流，对河西走廊地区的文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西北所见诸族，大都融合到了汉族中。隋唐的西方、北方主要是吐谷浑（祖先为羌族）与突厥（匈奴别支）。隋朝建立时，突厥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北方和西域诸地，均被其所控制。隋末唐初，突厥强盛，控弦百万，北据漠北，西控西域，直达里海以东诸国。隋唐吐谷浑据有今青海、新疆南部，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地域辽阔。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族。^①

三、西北民族的历史贡献

西北地区华夏族（后来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对开发西北地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虽然有争夺、有斗争，但融合是主流，汉族与各族人民的内聚力是主流。●省略原始社会部族的历史贡献，单从阶级社会以来，西北诸民族对社会的发展，就够笔述了。《史记》载：周革殷命，“蜀、羌、髳、微”（今陕南及陕甘交界地区）就随武王出征，立下了战功。西周末，犬戎、缙戎助申侯攻杀昏庸的周幽王，在推动社会向春秋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戎、狄的被征服和与秦人融合，他们在秦人由陇西、关中走向全国的丰功伟业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秦汉时期，他们与汉族人民一起，为开发边境经济洒下了汗水。尤其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开辟后，随着汉政权在西域的建立、徙民实边、士卒屯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广，关系密切。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如农业生产技术，凿井术，冶铁术和生产工具传到了西域。汉朝的以丝织品为主的商品也运到了西域。各少数民族的商人也把西域的产品，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桃、葡萄、西瓜、石榴等植物及骆驼、驴等牲畜带进了汉都长安及中原。汉族人民的计算方法、凿井、筑城、修房屋、生产技术、兵器制造等也相继传入匈奴；匈奴的养马技术和良马也传进了汉族，密切了汉匈关系，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西晋末年，腐朽的统治激起各族人民大起义，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了浴血斗争。《晋书》记载，惠帝元康四年（294年）匈奴族郝散起兵于上党谷远（今山西沁源县）；元康六年（296年），氐帅齐万年起兵于关中，郝散弟郝度元联合冯翊、北地（今陕西耀县及富平）羌、卢水胡起兵响应，秦、雍二州氐、羌也纷纷起兵，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声势浩大。他们在六陌（今陕西兴平县西）战败晋军，斩晋将周处。义军坚持斗争三年，为推翻晋朝反动统治贡献了力量。公元310年，流徙陕南的各族人民，聚众四五万人，在王如等领导下，数败晋军。

西北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光辉时期，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西北地区建立政权的有：匈奴贵族刘曜公元318年在长巡建立的前赵，迁上郡氐、羌二十余万口充实长安，又徙陇右之民万余户和徙秦州大姓氏族杨氏、羌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前赵拥军二十八万五千人，关陇氐、羌莫不臣服，并与石虎激战，保

①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